

5 汶川地震诗歌
写作反思与研究
Reflections and Researches
of Poetic Works on May 12th
Earthquake
12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2008.8(总第20期)

黄礼孩 主编

与“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有关的一点想法·····	程光伟·····	01
短暂的灾难，持久的苦难·····	耿占春·····	03
我们不会不阅读苦难·····	张清华·····	09
有关“地震诗潮”的几点感想·····	陈 妮·····	14
棕皮手记：新诗、地震、现代性、雅·····	于 堡·····	18
汶川大地震震后问题思考备忘录·····	西 川·····	29
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沉重？·····	谢有顺·····	32
诗心与诗性·····	沈 奇·····	37
诗歌的末日是诗歌的开始·····	池 莉·····	40
为什么诗歌总是被通知抢先登陆我们死亡的关口·····	东荡子·····	42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王家新·····	45
从一首诗谈“地震诗歌”·····	周伦佑·····	51
反向介入时代现场与心灵赴难·····	唐 原·····	54
自省：震后随笔·····	荣光启·····	57
灾难在继续·····	蓝 蓝·····	68
大灾难中的诗歌志凉·····	徐敬亚·····	70
为什么普遍写得这么差·····	桑 滢·····	73
诗的道德·····	孙文波·····	76
没有诗·····	张艳洲·····	81
沉默与喧嚣·····	李 森·····	84
尚未到来的地震诗歌：一个反思·····	一 行·····	87
地震诗歌照见当代新诗的痼疾·····	张德明·····	92
永无胜利可言·····	向卫国·····	95
自由写作与时代担当：再造诗歌浪潮的神话想象·····	霍俊明·····	99
苦难记忆与人的复活！？·····	姜金林·····	109

2008诗歌札记	钱文亮	115
诗可疗伤?	李少君	118
四川地震,诗人何为?	郑 惠	123
在地震中感悟“诗”的存在	叶匡政	125
群氓冲动的地震诗歌	梦亦非	136
关于地震或诗歌,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有 耕	141
“地震时期”诗歌写作的思考	张立群	144
诗歌秀场的缺席者	世 宾	147
地震带来的悲情应适可而止	李德武	151
地震灾难与诗人之变	刘 流	156
汶川地震后的两点思考	刘 黎	163
诗歌是人类忧患的“奶瓶”	白鹤林	167
迷途的诗潮	杜光霞	171
诗心之痛	胡传吉	177
永远的爱和美	余 娜	179
在地震中感悟“诗”的存在	布咏诗 (江涛)	182
折断胡须后的杜甫	颜艾琳	186
地震中没有诗歌	左春和	189
你和大地,有多大的距离	林茶居	192
诗歌的乱世:黔驴技穷,还是踩过薄冰	凸 凹	195
所谓“地震诗歌”轰动登场的背后	阿 斐	203
厄难之下的集体歌哭	潘灵剑	206
轻浮与厚重:抗震时期的诗歌写作	宋烈毅	208
诗人的血应该是热的	蔣益怀	212



程光炜

与“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有关的一点想法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文学杂志开辟专栏，发表与今年“5·12汶川地震”有关的诗歌、报告和讨论文章，我没仔细看，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段时间，像许多人一样，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感觉被多年的市场经济意识和观念所压抑、忽视和淡漠的一些东西，如同情心、怜悯、救贫帮困、正义感、英雄意识等等这些普适的价值，一下子被地震唤醒了，被激发出来了，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一种价值观。但这仅仅是社会公德、公信力层面的，能否变成同样具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与当代文学传统中的“表现时代最强音”、“火热沸腾的生活”、“唱响主旋律”等文学规范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说法都不在文学审美范畴，而属于社会学的内容。但是，在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创作中，与这些主题、题材关系密切的作家作品又很多，好像一接触现实，这种理解生活、时代和表现文学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否则，就违背了“生活的真实”。1997年我参加一届“鲁迅文学奖”诗歌的初评，有人就把歌颂“改革开放”、“南巡”的大诗拿来，要初选组 and 终评组强行通过，授予其“鲁迅文学奖”。结果一位担任终评委的老诗人发了很大脾气，才阻止了这种“社会学”的行为。我想双方的矛盾就出在，这位老诗人认为这些诗歌是社会学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有关人士认为它们表现了“时代最强音”，应该鼓励并推动其获奖。这种问题争论了几十年，在新时期初期遭到文学界的普遍否定，后来又被有关方面搬出来，置于文学“正典”的位置。那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在当代文学中形成了“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从事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人，都认为这种“紧跟形势”写出来的作

5·12汶川地震诗歌
创作反思与评述

01

品不能算“文学作品”，它即使貌似“文学”，也不是真正的“好作品”，因此出现了排斥的心理系统和解释模式；另一个传统是，在社会学领域，他们一直认为这是“好作品”，给了其很多获奖、资助的机会，如改编成电影、电视并占据着央视的“黄金频道”。但今天，文学的创作、批评、研究基本还是在“文学圈子”中进行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认定文学的常设机构、系统和程序，任何想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并且是“优秀作品”的作家，没有人能跳出这一范围去自立门户，搞另一套的。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可以写这类诗歌，但如何经过上述程序的认定，并成为人们“公认”的“好作品”将是一个问题。

二是如何与文学史上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品“接轨”的问题。我们知道，“政治”、“历史”不是不能表现，而是“如何表现”的问题。在文学史上，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等，都是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传世之作，它们所具有的感人至深的力量，至今都没有在读者中减弱。但是，在现代、当代文学史上，还鲜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茅盾曾有为抗日战争写五卷本长篇小说的宏大设想，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没有实现。我们看到的很多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总难摆脱“概念”的影子，作者企图把他对历史的解释强加给读者，不过效果上始终事与愿违。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原因是中国作家老想成为“历史学家”，老想讲一个故事，企图用与事件密切联系的“道德”、“伦理”（例如“正义”呀、谁对谁错呀这样的观念）来影响和震慑读者和观念。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伟大事件深处的“人性问题”，由于没有人性表现的复杂性、深刻性，所以这些事件是非常空洞的、苍白的。最近电影

《集结号》做了有益探索，但结尾仍给人很强烈的“概念”的印象，让人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其实在我看来，“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来体现的，这个人身上实际携带着“事件”的所有“重大问题、困惑和矛盾”，如果写好了事件背景中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事件才是有血有肉的、非常感性的，才真正是“震撼人”的。表现二战的电影《钢琴课》，焦点实际没有正面写战争，只写了战争毁掉了他作为钢琴师的生活。然后，在逃亡过程中，他一面为求生而拼命地挣扎，另一方面又写到，在逃亡中偶然因钢琴问题与那位纳粹军官的复杂思想纠葛。钢琴声隐约穿插在这个小人物可怜可悲的战争故事里，所以，显得非常真实、动人。因此，我的意思是，可以写地震，但不要把它“再次道德化”、“再次概念化”。而应该真正从人出发，发掘一个人在这个事件，包括在近二十年中的遭遇。他的生与死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牵涉到这几十年来如何认识人、待人的所有社会问题。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一是诗歌不是叙事作品，它缺乏完整的故事性和生活容量，仅仅通过十几行、几十行诗，就能打动人很不容易。这一点，小说、电影可能要做得更好一点，与它们的“文体结构”有直接关系；二是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怎么理想地通过诗歌这种形式来表现，我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形式上如何把握。这当然是诗人自己的事。但是，可以尝试，可以做一些实验。对这种地震题材，我认为可以采取长篇叙事诗的形式来处理，不过这需要去实地考察、采访，得有大量细节、对话、人物心态情态的深入了解和观察，仅仅凭空想象恐怕很难做到。

对如何写好这类诗，我基本没有明确想法，只是把我的一点点担心写出来，供诗人们参考。

2008-7-4 于北京森林大厦



耿占春

短暂的灾难，持久的苦难

世上会有一种声音，她总是带着罪恶开口说话，我说的是诗歌。无论说的是苦难或是幸福，她们的说本身体现着一种伦理的自律，他们的声音很低，带着内疚，甚至带着自戕的冲动。不知来自哪里。负罪感与内疚是她们话语中的音质，染上了痛苦的音色。这和高喊胜利的英雄是多么不同，与那些英雄的讲述多么不同。

有什么语言，不是炫耀，
不是煽情，却能丝丝入扣地
传递我疼痛的心跳——（砸石：“我认识的人都哭了”）

前一些日子，我只看每日网络上的地震信息，一直没有阅读关于地震的诗歌^①。因为读诗就得去想，而直至收到地震诗集时我还不知道怎样去想。这种复杂的情绪还不能被塞进这些精致小巧的形式中。看信息时我不用多想，只去了解。现在我也没有阅读地震诗歌的强烈愿望，如果想读诗，我倒是宁愿读诗人们在别的时刻写下的诗歌。我不想看到、这么快地看到令人惊愕的苦难被升华，我不想看到许多无辜生灵的死亡变成从天而降的灵感，不喜欢“家国不幸诗家幸”的无稽说法，客观上它就是置诗人于幸灾乐祸的位置。也不想看到巨大的苦难再次成为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又一次转化。不稀罕以“多难”来“兴邦”，多难意味着许多生命的创伤、痛苦与死亡，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兴盛不应该奠基于他人的血泪。在悲泣之后，甚至不想看到更多受难者的眼泪，同情者的眼泪，感恩戴德的眼泪。不

想看辉煌胜利的展示和英雄事迹的表彰报告，因为更多参与救助者因为没有能够救出废墟中的求教者默然而泣，他们的心还处于持久的内疚之中，因为更多的人没有被拯救的幸运而永远沉默了。还因为无数幸存者处在失去亲人的无以言表的哀戚与服丧的劳作之中。

而我无意中翻开的诗行却拯救了诗歌——

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国殇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白贲给了诗人说话的凭信。以便能在灾难之后写诗而不显得荒唐。它躲开了“诗意”，向道德压力敞开。

我说出了本应压在心底的话。我知道，一些话如果永远压在心底才会成为一种德性的根基。好在同样的感受诗人朵渔已经以悔罪的话语说出；他不是以否定自身情感的方式表达了悖谬的情感，以纯粹否定的话语说出了心里话？无法让渡无法代表也不能转化的是个人的死亡、罪责与痛苦。

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

是轻浮的，在伟大的废墟旁

论功行赏的将军

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

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

伸出的小手——

墓边的哭泣是轻浮的，包括

因悲伤而激发的善意，想想

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

是多么的轻贱！

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

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

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

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都是轻浮的

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

是轻浮的！（朵渔）

我明白，即使我不想不忍看这一切，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正确，无可指责，而值得敬佩。我为我自己的不在现场而沉默。既不在救灾现场，也不在诗歌现场。处在这个一点不拥有道德优越性的位置，处在一种更日常化的处境之中，我暗自想，也许不应该将灾难孤立化，灾难只是更持久、常态的苦难的一次令人意外的惊现。从而也避免将灾难中显现出来的我们社会得到拯救的希望与力量孤立起来。说实话，在汶川地震中我们的社会显现了一次自我救助、自我教育的契机。除了政府的及时反应，民间志愿者和民众的自我救助，媒体的即时报道和真相透明。更重要的一点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尤其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死亡，我们的社会第一次这样坦诚地宣布：“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个人的生命至高无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无可替代、值得全社会珍惜。要知道，我们不是通过大革命，不是通过战争或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也不是通过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历史都穿过了这些叙述，可遗憾的是我们的革命从未对世界宣布过

这样的信念，遗憾的是它一向只把个人的生命当作祭品、当作代价、人质或砑码——而是通过突发的大地震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和社会心理巨大创伤的时刻，向我们的社会宣布了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由总理站在地震废墟中、在瓦砾下孩子们的求救声中宣布的。

这一情景令人动容。然而，假如我们能够体察到这个地区或其它相邻相隔的地方的人们，在其社会日常生活中一直遭遇的贫困、不公正待遇和内心的创伤，他们的个人尊严与族群尊严所遭遇的创痛，他们合理的诉求所遭遇的冷漠，改变才会发生。瞬间的悲悯才会从群体爆发的本能情感，转化为真实持久的、对各种伤害行为有约束力的人道主义情感。才会发自本愿地希冀人们的生活多一些尊严，少一些损害。没有任何奉为真理的观念在历史中不再改变，唯有人的、一次性的生命及其不可无视的尊严高于一切。当我们的关切从对遭遇不幸的庞大数字转向个人，就开始转向了个人的命运与内心感受。人不是抽象的数字。

我想重新定义加法：一加一小于零点五，

二加二小于壹——数千加数千，

数万加数万，也一定不能超过一百——（哽咽）

哭泣和沉默的时刻度过了，谈论这一问题使我不再觉得如此冷酷了。现在，至少我可以原谅自己关于苦难说得多一点。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的社会首次明确宣布这一真理，尽管它私下里人尽皆知，尽管早已成为思想史上的共识。可我们应该就是指靠这些常识生活的，而不是什么超验的真理。这是一种既现代亦且古老的价值。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并竭尽全力减少人的不幸与痛苦，从宗教到革命，到今日经济技术社会，都曾继承承诺这一普遍价

值。没有对苦难的悲悯和对幸福的允诺就没有宗教，也不会有革命。如果宗教不能消除苦难，宗教就转换苦难的性质，把受苦受难变成受到遴选进入天国的徽记。革命反对宗教将地上的问题搬到天上，将政治经济学问题神学化，但它并不反对解决人类苦难问题，并不意味着不关切人类的苦难命运的改变。问题在于，后者因为相信人类的命运需要个人、无数的个人为此做出牺牲，并实施了强制性和惩罚性的制度形式，因而暴力革命沦为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强制与恐怖，变成了以集体名义对个人生命、自由与尊严的伤害。革命的暴力最终只是劫持了苦难，讹诈了苦难中的社会伦理以充作自身合法性不足的原始资本。以至于集体的幸福成为纯粹的欺诈与谎言。现代社会普遍接受了发展经济技术的承诺，试图再次将苦难问题进一步世俗化，并给予更加物质方式的解决。应该说，不论我们的文明怎样改变，或截然反抗前一个时期的解决方式，在其内在精神上，它们总是以人类社会的自治、以个人的幸福、生命的尊严为社会最终发展目标，而不只是生产总值。

但愿苦难启迪了我们的政治智慧。在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和周边地区突然遭遇地震，许多生命在瞬间被毁灭，它激发起人们普遍的悲悯之情，总理表现出他感人至深的慈悲之心，一些冷漠于民生的官史也显露出其人性之未泯。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与千万人遭遇的不幸唤醒了人们普遍的人道情感，生命的悲悯意识。这种情感与意识，不仅孕育过古老的宗教，不仅激发过革命运动，也是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个人生命的尊重，一切其他的社会和政治理念都来自于这一价值观的延伸：对个人的自主、自治和生命尊严的保护，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只要有公开透明的媒介及其舆论，当他人成为自然灾害的牺牲品，在无辜、脆弱的人需要我们救助的时候，人们并不难做出良好的反应；然而，当他人并不是仅仅以需要物质救助的弱者出现，而是以要求平等的生存权利，甚至是其他方面平等的利益，要求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自主的选择时，当他们不是以纯粹弱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以主张自身的权利的形象出现时，不是呼救，不是把我们当作拯救他们生命的救主，甚至其中包含了把我们当作一个论争者或对话者之时，我们还会具有这样的人道主义情怀吗？我们会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自治或自主意愿吗？人们不仅需要生命安全得到关怀和满足，他们的生命尊严、他们的人格、个人的和族群的尊严也渴望得到满足。当他人不愿意做某些不人道的政治观念的牺牲品时，我们是否会表现出同一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这二者之间的人道主义逻辑上一致的。可是显然，人们愿意在他人是弱小的、遭遇巨大不幸时刻的救助者与同情者，而恰恰没有意识到，他人的精神需要、他人的自主自治愿望是他们完整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更加重要的部分。我们能不能在灾难、不幸与苦难的启迪下，意识到人们更加普遍的痛苦与不幸？愿意去满足其他个人和族群的生命尊严，不受他人意志控制地自由生活，减少对他人自主性和自治社会的粗暴干预？如果说，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们需要救助的话，她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救助。而这一道义同样来自地旋的一刻所宣布的人文主义原则。

我知道，慢慢地，慢慢地，

她们会成为戒指纹，一触即痛。

指甲也会变白、渐渐坚硬。

但我要活得长久，活着！

——晃动着啦啦轻响的满手裂纹——

而先前已然半白的头发，
会啦啦啦退去！有多少、多少人啊——

在我头颅里共同密谋这件事情。

嘿，多么、多么绿啊！

他们的成功，真是匪夷所思！

依然卑微，但恶狠狠的心。

施万支绿发，是啊，太多、太多人了——（唾石）

我们可能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一是按照同样的人道主义思想逻辑，允许和支持他人的自主意愿和社会自治诉求，毕竟这是他们生命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同他们的生存权一样值得尊重。相反，如果我们只关心他们的肉体生命，而无视他们的精神苦难，无视他们内心遭遇的磨难，那我们就还不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人。如果我们只把他们当作难民和灾民时，才会同情他人的境遇，那么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从根本上认同的人，这样的态度事实上将一些特权阶级置于救世主的位置，把他人视为一种脆弱的、可令的乞讨者，把他人看作始终需要我们的“指导”、“监护”和“帮助”的群体（个人），那么，事实上也就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基本尊重。不能把他人降低为灾民、难民时才具备同情心，才具有人本情怀。毕竟，巨大的自然灾害与不幸是人类生活中非常态时刻，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优先考虑“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而在常态化的社会生活中，也同样应该坚持这一原则。与巨大灾难来临的瞬间有所不同的是，人的生命包括他的内心、他的精神尊严，他的个人权利不仅包括生存权，也包括生命的自由发展、精神生活的自律性要求、以及发展他的族群和个人自治性的生活。这一点就如灾难中灾区人们的自助自救

一样重要。

如果我们不想充当救世主，就不能把人民或“公民”的含义削减为灾民，就不能把人们永久的置于灾民处境，不仅在他人是弱小的、呼吁我们救助的时刻，而在他人与我们平等、或疾呼主张这种平等权力时，也具有这样人道的同情同理之心。因为人们毕竟始终生活在不测的宇宙命运之中，在来自于自然宇宙和各种意外的伤害之外，不应该再加上来自某种观念、某种原教旨的意识形态及其不合理体制的伤害。人们形成社会、建构制度是为了扩展和保护脆弱个人不受独断与暴力的侵害，而不是使制度或意识形态置于绝对真理的位置，从而给希望改善它的批评者带来进一步的伤害、或成为惩罚人们自由意志的理由。

在人类历史中，自然成为大规模苦难根源的黑色时刻并非常态，令人悲哀的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不合理或充满暴力的政治制度及其战争常常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如果“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就不能把虚幻的概念和统治阶级的权威置于个人或族群的生命及其尊严之上，不能把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置于其他社会群体和更多人们的意志之上。出于同一人道主义的精神逻辑，既对自然灾害中的生命充满悲悯，也要提防苛政猛于地震，以防社会能量不能合法表达被长期压抑而形成毁灭性的社会动荡。当别人处于弱小和危险之时，需要我们成为救助的英雄之时，或需要我们的怜悯时，道德情感容易与之共鸣，认识也易于达成共识，这是极其古老的人类社会的伦理意识和传统的道德情感。然而，当他人不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当他人以自主的、平等的形象与诉求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能否同样意识到他人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幸，他人内心世界所遭遇的磨难，而且不是别的什么力量造成了他人的这种

不幸，而恰恰是权力的傲慢专断，以及我们的冷漠、我们的傲慢与偏见，或是我们想象中的自身利益，将利益相关性简化为利害敌对关系乃至战争状态——此时此刻，我们能否真正拥有人本主义的道德情感、拥有一种被发展了的人道主义社会伦理，才是检验我们自己的时刻。

对灾难中的人产生同情是容易的，对他人的内心苦难、生命尊严的磨难能够产生同情就需要更开明的人道主义想象力了，而对他人以自由平等的态度向我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时，能够倾听他人的话语、理解他人的真理、从而给予他人最大的善意，事实上也将成为我们的自我表述、成为一种针对我们自身是什么、要成为什么的表述，而不仅仅是他人或与他人相关的一件事了。在汶川地震中的经验中，能否在对灾民的物质与心理救助中，发展出对我们沉沦已久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救赎？

最终，让人说话，允许他人说出自己的不幸、痛苦与渴望，允许他人进行自主、自由的和公开的表述，就是一件特别具有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意义的事情了。个人意见与公众意愿的表述具有深刻的社会道德精神内涵，公开透明的信息，以及自主的、对内心感受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叙述，是一种特别深刻的、特别巨大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力量。试想，如果汶川地震不是因为政府允许对灾情进行即时的跟踪的新闻播报，使全社会甚至使国际社会得以较为真实的了解真相，难以想象会唤起如此巨大的社会救助热情和社会伦理情感。叙述是一种深刻的社会伦理资源，对一个健康的社会而言，自由的叙述不是可怕的力量，没有它才是可怕的，自由的叙述经验、说出内心的想法和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比任何善意的独裁性的道德意志都更加有力，并且有利于社会自身的自治、和社会的健康成长。我们最

终让苦难帮谁的忙？苦难不应该再次被劫持，救助也不应该变成感恩戴德。苦难应该成就一种政治智慧。苦难激发的是爱、同情与怜悯。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非利害关系的伦理必要性，无偿付出和支持他人的生命意志。自然灾害激发的社会伦理热情应该能够转化为遏制或减少对人对人、制度对人的伤害、对他人尊严的维护的持久力量。我说应该，因为：对人类社会来说，只有爱、同情是最充分的资源。

一首诗能拯救什么？

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

并且嗅回游荡在玉米田

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

如果一首诗能让我们忏悔

不爱，或爱的不够

就是完成了她的救赎（林雪：《在绵阳》）

1 本文所引诗歌均自《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见民刊《诗歌与人》总第19期，黄礼孩主编，2008，5月（广州）



张清华

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

——看待“5.12 诗歌”的若干角度

他们从来不会错读苦难，
这些古代的大师，何其准确地理解
它在人间的位置；它发生的同时
别人正在吃，在开窗、或是无聊地漫步……

——W.H.奥登：《美术馆》

1994 年，一位名叫凯文·卡特的南非摄影家在苏丹拍摄到一幅旷世罕见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饥饿女童在泥地上爬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即将饿毙倒地的情景，她那羸弱如纸的身躯再也支撑不起那颗显得过于硕大的头颅，而她身后约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一只食腐的秃鹫正等待她倒下的一刻。这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饥饿的苏丹》发表，震撼了全世界，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张照片为激发全世界的良知、为赈济饥饿非洲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此前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力量。但此后围绕它所产生的伦理争议，却使摄影家送了命。

据凯文·卡特说，他为了这个场景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他本来指望会出现兀鹰展翅的刹那，但最终没有等到。按说单纯作为新闻照片，这确是一个杰作，它所抓取的瞬间是一个职业新闻摄影家一生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它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效果又是任何语言所无法企及。但是仔细审视，在这张只有兀鹰和女孩两个角色的照片背后，还隐藏了“第三个角色”——那就是在这死亡画面

5.12汶川地震4周年
纪念文集 张清华

09

前等待的这个人。这个摄影家。他和那个虎视眈眈等待死亡之食的兀鹰之间构成了一个另一意义上的同类——它们都在等待自己的猎物。唯一的不同只是，它是在等待食物，而他则是在等待自己的职业机会；它等来的是——顿禽兽的暴殄，而他获得的则是人类的奖赏和职业名声。因此，这幅照片暗含了一个巨大的伦理拷问：这个看起来震撼良知警醒责任的杰作背后，创作者是否扮演了一个与兀鹰相似的角色？摄影家为什么不去追赶这死神般的猛禽，或者投身救助女孩的现实之中？固然，由它所唤起的道德力量业已激发世界去救助了更多这样的孩子，但面对这一个、这个生命的现实和个体，摄影家却扮演了一个残忍的角色。凯文·卡特由此遭到了舆论的质疑和自己良心的谴责，三个月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居所中用一氧化碳自杀。

之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是试图引发一个相似的写作伦理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阿尔多诺那句著名的格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曾提出了类似的伦理问题，当人类犯下了这样永远难宽恕的罪行时——不管你是哪样的人类，都再无资格和权利用诗歌的名义表达情感和思想，因为诗歌的精神和集中营的犯罪之间，无法想象是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人类身上共存的。所以奥斯维辛之后，如果还会有诗歌写作的话，要么只能是写“野蛮的诗”，要么这种诗人就是野蛮人，否则不合逻辑。阿尔多诺当然无法阻止、也不可能阻止诗歌的存在，但他所提出的巨大的道德拷问的命题，却令人无法回避和抗拒。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道德状况，必须对其写作和表达的资格有所担当和证实。对于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诗人和写作者都曾经认真思考过。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场写作的主体权利作出追问。而且，

许久以来我们的写作所面对的，一直是社会或人性意义上的命题，对于这样的自然之灾，这样的一场“没有犯罪者”的悲剧和“屠杀”又如何看待，却属未曾准备。而国人在灾难面前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创作力、一时间涌现了数量如此之巨的“地震诗歌”，更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很显然，这场写作已经构成了一个景观、一个无法不认真面对的现象，如何来面对和评价这些诗歌、这场人数众多、情景壮观的写作？我感到了犹疑和困难。从现实的意义，我当然应该赞赏和敬重一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表达悲伤和怜悯、表达哀思和爱心的写作者，但是当人们用不无过剩的热情来比赛产量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表达他们的怜悯和爱、甚至以伤逝者的角色表达感恩和“幸福”的时候，当有舆论将这同1976年的一场政治诗歌运动联系起来进行比拟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气味正在发生可疑的变化。

很显然，我们必须首先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即：写作的一切命题、一切写作者的潜角色必须得到拷问、得到检验。只有这样，我们从语言中所获得的，才不仅仅是虚拟的慷慨和廉价的赞美，不是替死者感恩、为孤残者代言“幸福”的虚假写作，不是将哀歌变为颂歌、借血泪和生命来构造丰功伟绩的偷换式、盗贼式写作。这样的写作在过去也许不是问题，但果真像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人类的重大灾难或悲剧不是以巨大的进步为补偿的”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国人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所获得的“补偿”，就是接近于真正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认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只是抽象的“人民”——的第一位的价值。人们的眼泪、悲愤、慷慨捐赠与救助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无疆大爱，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进步所产生的价值共识，而这个共识正是我们检验

政府救助工作是否得力 and 到位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一切写作和文字表达的试金石。有的“写作”正是因为违反了这样一个价值共识而遭到了批评、反对乃至谴责和攻击。这表明，如果说诗者的立场是仍旧使用了过去那种公共利益大于个体价值、抽象事物大于生命价值的世界观的话，那么他的说法将因为悖逆和挑拨了这一价值共识和历史进步而遭到唾弃。

因此，我首先要为那些带有“拷问”意味的写作叫好，因为只有对写作者自我的合法性抱有质疑和反思的写作，才更具有思考的价值和感人的力量。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死者和伤者的悲悯，也是对普世价值的维护和确立，对生者的道德教益。我们应该庆幸出现了这样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是它们挽救了这场写作，赋予了这场“诗歌运动”以合法性。如果要举出例证的话，我愿意以朵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作为例子，它对包括“写作”以及自我在内的一切灾难承受者之外的人与物、行为与表达的普遍质疑，恰好凸显了这写作的意义：“……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是轻浮的，在巨大的废墟旁/论功行赏的将军/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伸出的小手/……想想，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是多么的轻飘！/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是轻浮的！/……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悲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一切怜悯、救助和感人的至爱，都无法抵消万下生命和肉体的毁灭这一悲剧，无法抵消死亡者的死亡、伤痛者的伤痛。谁也没有权力用别的什么东西和言辞，来覆盖冲抵这无边的悲伤，没有权力随意地叙述和书写任何有关的人与事、情或理，“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真正得体的表达也许就是“沉默”，但仅仅用沉默却同样也无法表达沉默。如果说这首诗中有一个言说的立场的话，那么它便是无限接近的“上帝的立场”了，对于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民族来说，读到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有理由感到欣慰。当年奥登在观看美术馆时，对古代画家们在灾难题材的绘画中所表现的伟大立场和道德力量的由衷赞美，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启示和佐证，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不朽的人性力量与价值光辉，离开了自我拷问和灵魂介入的言说是没有价值的。现在中国的诗人也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理解角度，它可以说见证了此次赈灾行动中民族精神与价值认知的飞升。

因此，对生命的理解和价值尊奉的程度，将是决定这场写作中文本价值的标尺。荷尔德林说，“人能够将自己置放到他人的处境中，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这正是人的需要”。“如果不能以这样的理解和精神去关怀，任何“灾难写作”都将很难获得严肃的意义。它甚至不如为灾难的承受者们

做哪怕一点点实事来的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去讴歌那些用身体而不是语言、用物质而不是情感去支援灾区的人，那些本身介入了救灾实践的人们更有资格书写他们的体验和思想。地震以后，大量的媒体和出版人用了各种形式、以最快的速度赶制了各种版面和出版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们有可能发挥的作用，但面对上述伦理，它们的价值甚至动机也将首先面临质询和拷问：当我在5月末收到由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特刊《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惊异他竟然有如此迅疾如职业记者的意识和速度；我的第二反应是疑虑，难道在这举国悲恸的日子里真的还有必要、有那么多人有心情写下那么多的诗歌作品？但当我读了诗集的前言，得知他和他的同仁们为赈灾举行了巡回诗歌朗诵会，并为灾区募集了8万余元资金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到他有这个资格来编辑这样一本诗集，因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语言与修辞的工作，8万元对于这巨大的灾难，对于数百亿的捐款来说也许是微薄的，但他们却实现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担当，实践了他们的“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理想：“‘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精神就是敢于去担当，去照亮，去恢复人性的崇高。这一刻，诗歌是一个行动者……”^②是的，诗歌必须同时参与这爱的“行动”才有合法性和价值。因此当我读到另一位诗人哑石的“诗歌日记”的时候也深深地认同他的说法：“周围的一些博导们，开始/抽着名烟，喝着茶，/（眼中，不时闪过恐惧）/讨论灾实的哲学意义，国际影响……/他们都曾是我很好的朋友。/突然，我开始厌恶他们，说不出理由”——

我扭头离开他们，来到离学校最近

的血点处，献200毫升血；
足足排了四个小时的队，
队伍中，大多是年轻人，甚至
有的看起来还是嘻嘻哈哈的，
（雨中，有一对恋人还站着接吻）
显然不严肃。我得承认，
今天，我真的、真的更喜欢他们。

我必须说，这首诗也让我充满感动，因为它使诗歌的表达获得了人格实践的支撑，行动见证了语言，鲜血介入了修辞。同样情境的还有林雪那样的亲历式写作，她的诗歌是写于灾区的现场，因此具有了“将自己置于他人处境”的见证力量，她的一首《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的巴西》^③中有这样的句子：“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从没有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滥用？/我愿意把破碎这个词最后再用一次/……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整的……”我们自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具有“现场”和亲历的实践，但无疑，这样的写作是最有感染力和可信度的。这看起来似乎苛刻，但自占以来诗歌的常理也是如此，最感人的诗歌必定是渗透了诗人生命见证和人格实践的诗歌，渗透了人生对文本的“介入”和践行的诗歌，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甚至项羽、岳飞、文天祥，他们的诗之所以有感人的力量，无不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悲剧生命人格实践了他们的诗歌。虽然这些悲剧各不相同，但“失败”、牺牲或者挫折，都是其感人力量的真正源泉，这是一个诗歌的定律。

对于那些最广义意义上的“地震诗歌”写作，我只能说，它们的意义都需要检验——不是让批评家或者“质检员”来检验，而是要用每一个写作者

自己的良知来检验，用其思想的状况和精神的现实来验证。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次民族激情的释放，一次价值观的集体反思和蜕变，一次道德良知的奋起，一次哀情的诉说，甚至一次泪水的伟大奔涌……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用眼泪来洗刷这些年欲望的红尘和道德的锈蚀。太需要用水泪洗涤我们纯化的良知和彼此隔膜的心灵了。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在意这场运动会不会留下长久传诵的诗歌作品，不在意诗歌会不会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获得“复兴”，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会像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说的那样，成为“激发神性和灵魂”的形式，成为唤起良知、推动社会进步的借力方式。如果我们必定要寻求“历史补偿”的话，那么好好守护由鲜血和生命代价唤起的“人本”价值、把这样一种价值贯穿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我们的日常规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我甚至认为，当我们不仅仅是对地震中人民的生命才那样珍惜尊重，不仅仅是对那些特殊的伤者才那样真情关怀、无私救助的时候，当我们对所有人民、所有的生命都同样珍视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为地震付出的惨痛代价才算是没有白费，在苦难中获得

的道德奋起和精神净化才不会成为一个空幻的泡影。

当然，作为一个观念的表达者，“我”说这番话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反躬自问：我怀疑和追问的资格何在？我言说的凭据和理由何在？我是否也试图用力所能及的付出，践行了我所推崇的价值？在此，请让我向那些勇敢和果断的志愿者、抗震救灾的实践者、竭尽绵薄之力去担当责任的普通人们、向那些为救助他人而付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努力使我们民族有资格一起持续这场思考和自审。

2008年7月14日深夜急就于北京

① 荷尔德林：《论宗教》，《荷尔德林文集》第21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 黄礼孩：《我们都是幸存者》，《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诗歌与人》总第19期，2008年5月。

③ “若西”：羌语，情歌，原注。见《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



陈超

有关“地震诗潮”的几点感想

汶川特大地震在中国人民心中激起的哀痛、悲恸、无告、坚韧救援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现代社会以来，诗歌特别是新诗，始终被有敏锐的人称为生活的灵敏的触角，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晴雨表。回顾历史，她也无愧于这一称号。所以，我认为这次诗人们不约而同的诗歌写作及有关救援的爱心动，理当受到我们深深的赞叹，但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此，对有一些人就此次大地震引发的诗潮，提出“汶川之后，诗人何为？”“地震震醒了中国诗人，不再自我迷恋”、“诗歌终于回到社会承担”、“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此等等说法，我是不大以为然的。其实，中国现代诗歌从来就“在”我们具体的生存语境中，并将继续“在着”。这么说的意思是，平常世俗或个人生活有与其相应的诗歌，而当重大社会事件重大灾难来临时，自然也会有与其相应的诗歌。这就是诗与生活的对称，这就是“人间”之“词话”的道理。所以，不是中国诗人们“被震撼”，觉今是而昨非，突然变得有“责任感”了，而是他们的生活中面对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而广大民众对事件本身的关注程度，也决定了这次“地震诗潮”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看到，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诗人们在第一时间迅速作出了自己真实的心灵反应。作为河北人，我对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及其诗歌反应至今记忆犹新。那次地震发生后，诗人们的反应完全集中在对“抗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及“优越性”的歌颂上，这些内容当然应当表达，但其心灵本真的反应中的一些根本内容却也被遮蔽掉了。而这次“地震诗潮”，一个重要意蕴则是，面对